

文化与诗学丛书

童庆炳 马新国 主编

文化研究： 西方与中国

陶东风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G04
T315

文化研究 ：西方与中国

童庆炳

马新国

主编

文化与诗学丛书

陶东风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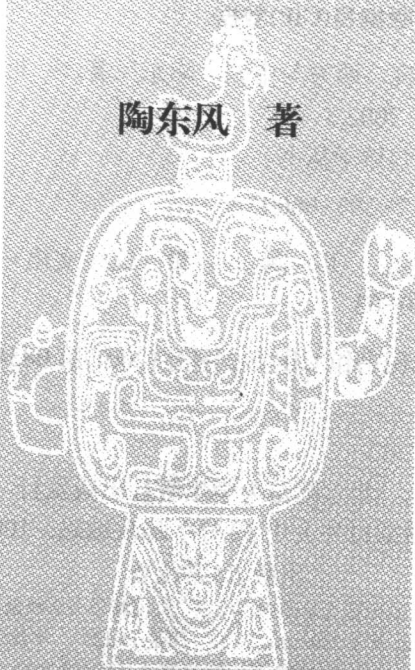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化与诗学丛书

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

陶东风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研究: 西方与中国 / 陶东风著.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3

(文化与诗学丛书)

ISBN 7-303-06003-0

I. 文... II. 陶... III. 比较文化 - 中国、西方国家 IV.G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3410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出版人: 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62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定价: 17.00 元

《文化与诗学丛书》编委会

主 编 童庆炳

副主编 马新国

编 委 童庆炳 程正民 马新国

李壮鹰 罗 钢 王一川

李春青 张海明

总 序

童庆炳 马新国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发展着。我们研究着的专业——文学理论——也是如此。回想 80 年代初期，文学理论界普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法规性”口号产生了反感，急于摆脱文艺的“他律”的束缚。人们开始热衷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研究，热衷于主体性的研究，随后又开始热衷于文学语言的研究，“自律”的研究成为时尚。可以说在文学理论这个园地里先后出现了“审美论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实际上当我们实现这种“转向”之时，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则开始了另一种“转向”，那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的勃兴。西方文论向文化视野转移，有其自身的原因。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晚期，自身的社会问题就越多。如种族冲突、阶级冲突、性别冲突、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工业与自然的冲突等等，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文学读者已经对兴起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评”感到不满足，因为他们主张文本绝对“自律”，就艺术谈艺术，完全脱离社会与

现实，从他们囿于文学文本自身做法，使读者无法从他们的笔下看到时代的面影和现实中紧迫问题的发展。阅读文学的大众，绝大多数总是关怀现实的。文学大众对“新批评”感到厌烦，他们要求有一种切中时弊的批评模式。这样就有一些理论批评家要超越“新批评”，重新重视文学的“他律”性，他们强调文学艺术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中，强调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如何“独立”，都不可能与社会文化毫无关系。相反，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中有丰厚的文化意义，文学艺术作品不能不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视野的文学研究逐渐成“气候”，各种“主义”应运而生。针对种族身份认同问题，出现了“东方主义”批评，针对性别对立问题，出现了“女权主义”批评，针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出现了“后殖民主义”批评，针对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出现了“新历史主义”……这种文化研究发展到极端，甚至提出了文学研究中的“反诗意”的观点。当西方兴起这些浪潮的时候，我们的理论界正在进行“审美”的狂欢“主体”狂欢和“语言”的狂欢，直到20世纪末，我们才发现我们又“落伍”了，要求走出“审美城”，呼吁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艺术文化学”或“文化诗学”的要求也被提出来了。

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今天提出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在西方的面前“落伍”的问题。文学的文化研究的根源在中国自身的现实。近2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出现

了不少可喜的新变化，故步自封的局面被打破，思想解放冲破了许多原本是封建刻版的条条框框。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勿容讳言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总起来看，主要的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商业主义”等。“物”、“金”、“商业”都是好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是一旦“唯”这些东西为圭臬，为上帝，为神明，那么物欲、金钱欲、情欲、交换欲等人的生物性物欲望就主宰了人的精神世界，人文理想就受到了侵蚀、压迫和消解，道德水准下降，腐败现象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中一味宣扬上述种种生物性欲望的作品表示不满，对于一味玩弄语言形式的作品不满，对于没有血性的没有爱憎的没有鲜明文化价值取向的作品不满，要求理论批评家不能不关心现实。同时也不满过分专注于作品形式的“内部研究”和过分关注于诗情画意的审美批评，希望文学研究和批评更多地触及社会现实问题，并回答人的生存境遇问题，例如，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关系问题、都市与乡村问题、东西部问题、廉政问题、古今问题、中西问题、性别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文本的价值阅读问题……不但如此，而且在解读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也要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和分析，揭示其真实的文化蕴涵，以便帮助今人了解古人和外国人是如何来解答他们生活的时代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文学理论学科中强调文化视角，乃是根植于





我们自身现实的土壤中，并非从外国搬过来的。

文学理论学科要发展，就不能不随着时代的要求做出新的应对。目前开始受到重视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学科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文化研究的所谓跨学科反学科的方法，可能冲垮原有的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过分政治化的话语，也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理论面临的挑战。但是，文化研究由于其跨学科的开阔视野，和关怀现实的品格，也可以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和密切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使文学理论焕发出又一届青春，这难道不是一个发展自己的绝好的机遇吗？

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中带有真理性的观点和做法，如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重视文学艺术与语言、神话、宗教、历史、科学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有分析地加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又是适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拿过来，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但我们有我们自身的社会现实问题，我们要从我们的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文化研究应该走自己的路。对于西方那种过分政治化的文化研究，对于“反诗意”的文化研究，我们认为不足取的。我们大可不必走西方那种以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的路子。文学理论的建设应该是累积性的，如“文革”前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社会历史批评经验，在经历过“文革”的教训之后，在新时期开始那些年代所取得的关于文学审美特性的成果，关于文学语言特征的成果，还有其他成果，只要是好的，具有真理性的，不但要

继承下来，而且要继续研究下去。在审美、主体、语言和其他方面，仍然有发现的广阔的空间。对于文学的文化研究来说，文学的诗情画意是其生命的魅力所在，怎么能把“诗意”“反”掉呢？我们仍然坚持，文学批评的第一要务是确定对象美学上的优点，如果对象经不住美学的检验的话，就值不得进行历史文化的批评了。文学是诗情画意的，但我们又说文学是文化的。诗情画意的文学本身包含了神话、宗教、历史、科学、伦理、道德、政治、哲学等文化含蕴。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诗情画意与文化含蕴是融为一体的，不能分离的。中国的文化研究应该而且可以放开视野，从文学的诗情画意和文化含蕴的结合部来开拓文学理论的园地。这样，“文化诗学”就不能不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广义的），保持和发展审美的批评是必要的；但又是文化的，从跨学科的文化视野，把所谓的“内部研究”于“外部研究”贯通起来，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和联系现实仍然是发展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机遇。“文化诗学”将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文化与诗学丛书”是北师大文艺学学术群落向文艺学前沿运动的又一次努力。这 10 本书内容不尽相同，有古有今有中有外，著作者的个性也较分明，看起来“面貌”并不相似。但我们的方法却都是“文化诗学”的。追溯文化背景，揭示文化意味，谈古必然要论今，谈西必然要论中，跨越中西古今文化距离，这是本丛书的一个



基本学术追求。

限于我们的学术功力，丛书中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错漏，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2000年5月2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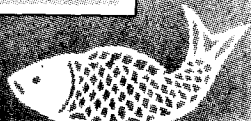
前言：文化批评向何处去

90年代中国批评界一个引人注目的走势或许就是从文学批评向文化研究(也有人称文化批评)的转化。对此文学界可谓众说纷纭、人言言殊。有人在悲叹80年代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的逝去,也有人在欢呼文化批评的黄金时代的到来。除去这些情绪化的言论不谈,比较具有学理性的问题也同时提了出来。比如: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是什么?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化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原因?这种转化是文学批评的转机还是文学批评的堕落?文化批评是不是一种社会学批评或所谓“外在批评”?如果是的话,它与审美批评的关系又如何?它是向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倒退么?文化批评对于批评者提出了什么要求?等等。

1. 文化批评出现的语境

在我看来,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出现既有中国社会文化自身的原因,也离不开西方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影响。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与学术传统的差异,中国90年代的文化批评与西方的文化研究仍然存在极大的差别与距离。

关于文化研究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问题,许多学者指出了90年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大众文化兴起在这方面的重要性。有一位从事文化批评的学者描述道:“自80年代中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市场和文化工业突然‘崛起’,大众文化有如一片燎原大火蔓延全国,使中国的文化景观在短短几年内一





2

下子改观，批评界和理论界对此应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而文化研究对回应这些问题有一定的优越性。”^①另外一位批评家在谈到她所在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动机时联系自己的经验指出：“成立这个研究室的动机，的确是为了尝试回应 90 年代文化现实对我们提出的挑战，同时也和我个人所经历的 90 年代的困惑不无关系。”这种困惑是指“因无法容忍商业化突然全方位的降临中国而感到一种绝望乃至某种程度的精神崩溃”，“我们仿佛一觉醒来，突然面对着大众文化、商业文化、文化市场的全面兴起。”在这种情况下，要回应现实文化的挑战，原来的知识结构已经远远不够。这是她成立文化研究室的根本动机，同时还包括对于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回应。用她自己的话说即：“要尝试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首先是出于中国现实所提出的问题，不期然呼应着文化研究所设计的基本命题；其次，中国文化研究的展开，其本身正是试图回应中国现实与西方理论的双重挑战。”^②

笔者基本同意这样的分析。中国的文化研究在 90 年代的兴起的确具有本土文化语境与西方理论影响两个方面的原因，但是其中本土现实的挑战是更为根本的。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颇能够说明这个问题。这本书在大陆初版于 1986 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研究成果在中国的第一次亮相。但是它在当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人们对它的兴趣大约在 1992 年左右才突然巨增。个中的原因恐怕是：90 年代中国的文化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市场化、世俗化以及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得人们感觉到了文化研究的理论魅力。而且十分明显，人们对于这本书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它对于后现代大众文化形态与文本特征的描述（比如平面化、机械复制等）。另外一个同样来自接受史的证据

① 参见：《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知识出版社，1999 年，第 214 页。

② 同上，第 216 页。

是，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中文本出版于1990年；但是它同样也是到了1993年开始才被大量引用（尤其是其中“文化工业：欺骗大众的启蒙”部分）。这些都表明：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文化理论的接受与选择受到自己的现实文化需要的深刻制约。

在这里我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在分析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的原因时，还应当超出我们通常理解的“文化”（更不必说“大众文化”）领域，把整个社会问题纳入研究视野。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90年代发生很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与80年代相当不同的特点，其在大众与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也有了相应改变。一方面，90年代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向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的方向深入，在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在80年代预见不到想象不到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90年代的改革开放在经济、政治、文化的领域以不平衡的速度与比例发展，这已经成为中国式市场经济的重要特色之一。由于以上原因，90年代中国社会面临与80年代不同的诸多问题，比如下岗工人问题、国企改革问题、社会治安问题、贪污腐败问题、社会公正问题、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问题等。其结果之一是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一般大众的社会政治热情、社会参与热情重新高涨。如果80年代末文学批评热衷于内在批评、语言批评、形式批评与当时的知识分子政治热情的相对冷漠有某种勾连，那么，90年代文化研究的兴起无疑是知识分子参与欲望重新强化的结果。众所周知，文化研究的特点正在于它的强烈的政治关切与参与热情，它是一种政治化的学术或学术化的政治（参见本书第一章），不是书斋中的纯学术。它不仅关注我们习惯上说的“文化”问题，而且关注政治乃至经济问题（文化研究视野中的“经济”问题从来同时是政治问题）。或者说，文化研究所说的“文化”本身就散发着强烈的政治气息，它总是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问题结合在一起，它要么





起着维护现存社会关系的目的，要么挑战与质疑着这种社会关系。因而，从事文化研究而又想回避 90 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

2. 文化批评是一种外部批评么？

对于文化批评持否定或保留态度的学者大多认为文化批评是一种与文学无关的外部批评。比如《南方文坛》1999 年第 4 期上发表了对于数量众多的学者与批评家的长篇访谈，题为“关于今日批评的答问。”其中第一个问题即是“为什么当下的文学批评逐步转向文化批评？您认为文学还能否回到文学？”对于这个问题，相当多的学者把文化批评视作与“内部批评”相对的外部批评，或与审美批评相对的社会学批评。比如“……文化批评说到底仍是一种外在研究，从批评思维上说，它与先前的社会学批评并无本质的差别，因此它仍然存在着强加给文学太多的‘意义’、‘象征’，从而使得文学非文学化的危险”（吴义勤）；“文化批评从‘新批评’派观点来看，就是‘外部研究’”（童庆炳）；“文学批评的‘场’，归根结底还是文学，……我不希望太多的批评家一头扎进‘文化’、‘思想’或‘精神’而走失”。（施战军）

在这方面，阎晶明先生的《批评：在文学与文化之间》^①一文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文章认为：“90 年代的文学批评是一个更加缺少学术规范的时代，80 年代活跃于文坛的批评家，在这一时期纷纷转向，把目光转向更加庞杂的目标，就文学而言这是一个虚化了的目标。批评家们的注意力被转移和分散到了更大的文化问题上。”作者以人文精神与后现代主义讨论为例责问：“这些学术主张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文学批评？”作者认为这两者都已经在“目标上偏离文学”。这偏离了目标的批评就被作者指认为“文化批评”，而在这种文化批评中文学作品就成了被批评家随意搬弄的“小小旁证”。作者进而忧心忡忡地写道：“文学批评就这样被文化批评取代，成为无足轻重的

^① 《太原日报》1999 年 9 月 6 日。



唠叨陪客，对作家作品的具体阐释成为不入潮流和缺少思想锋芒的可怜行径。”作者呼吁：文学批评应当回到“自身”，回到“文本阐释”，“这是文学批评不做文化附庸、不被文化批评淹没的必经之路。”作者没有对于什么是“文学自身”、什么是“文学批评自身”进行令人信服的阐述，从而使得回到“自身”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实际上，这个所谓“自身”恐怕是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如果说“自身”是指新批评或形式主义的那种限定在作品“内部”的文本细读，那么，这只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没有理由以此否定其他的批评方式，包括文化批评的方式。何况绝对的“内部”也是不存在的）；更重要的是，从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这样的二元对立方式来评论文化研究本身就违背了文化研究的宗旨（文化研究从来不承认这样的区分），因而不适用的。试图通过确立“文学”或“文学批评”的“内”与“外”的“边界”来把文化批评驱逐出去是无济于事的。但是作者指出的文化批评的随意性、情绪化的问题（所谓“不读作品即可批评，略知大概即可说三道四”）的现象，是的确存在的。中国90年代的文化批评多数具有情绪化、随意化、“随笔”化的倾向，学术水准总体而言并不理想。比如，在文学领域，文化批评普遍存在脱离文本“离弦说象”的倾向。这里我并不是要规范文化研究的写作品体或写作方式（这样的“规范”行为正是文化研究要批判的），而是指出，不管是什么文体与方式的文化批评都必须是建立在坚实的学理与经验材料基础上，更要具备一种明达的对话交往理性。文化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关切，但它不是政治宣言；它也具有明确的价值立场（因而从来不标榜客观的、中立的实证主义），但不是随意的情绪发泄，更不是漫骂与侮辱。

也就是说，90年代中国相当一部分文化批评的问题不在于什么偏离了文学与文学批评“自身”。真正的问题毋宁是：文化批评虽然不同于所谓“内部”研究，但是它同样应当具有理论性与学理性，同样应当扎根于具体的





经验材料与文本解读，它与内部批评的分别不是文学批评是根植于文本的审美细读，而文化批评是脱离文本的胡说八道。只能说是它们解读文本的方式乃至目的是不同的。文化批评的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把文本当作一个自主自足的客体，从审美的或艺术的角度解读文本，其目的也不是揭示文本的“审美特质”或“文学性”，不是作出审美判断。它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①而恰恰在文本的解读方面，90年代的文化批评的确做得不够。至于像西方那种具有深厚的社会学或人类学背景、以深入的田野调查或经验分析为基础的文化研究在中国就更加缺乏。

我们不妨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例来谈谈文化研究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问题。文化批评的政治性是不可否认的，许多文化批判家都直言不讳地承认乃至强调这一点。但必须指出的是，文化研究中的“政治”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狭义政治（如党派政治或政府行为）。在《东方学》中，赛义德专门谈到了“纯粹政治”与“政治知识”的关系。他指出，人们很容易习惯性地认为关于莎士比亚的知识是无关政治的，而关于中国或苏联的知识是政治性的。赛义德的正式职业是人文学者，这个标签说明他的领域中“发生的一切与政治无关”。赛义德认为，这种认为莎士比亚研究无关政治的教条的一个原因，是莎学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通常意义上的政治结果，而像苏联的经济这样的研究领域似乎就与政府利益密切相关。人们还倾向于认为：人文学者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政治只有偶然的重要性，而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意识形态则被直接组织进了研究者的研究材料，因而必然被认为是政治的。^②

赛义德理解的“政治”的含义要更加宽泛。他指出：“没

① 参见伊格尔顿：《二十世纪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② 参见《东方学》中译本，三联书店，1999年，第12页以下。